

雷鳴遠神父——中國人的傳教使徒

安貝蒂著 勞寶霞譯

十九世紀末的比利時剛城，一個年僅十一歲名叫萬桑·雷博的男孩某天毅然宣稱：「我要到中國去殉教。」他日後果然能夠完成兒時的夢想。他就是後來的雷鳴遠神父。這位未來的中國傳教士在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九日生於比利時的剛城，青年時行事認真，常被傳教烈士的故事所感動。他在十八歲的時候進入巴黎遣使會修院，並早已嚮往到遠東傳教，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中國人。

羅馬傳信部在一六九九年授權第一批遣使會會士到中國傳教。在一七七三年八月十六日，教宗格萊孟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穌會，該修會在華中華北的

傳教工作需要由另一個修會接手。巴黎外方傳教會很快便推掉了到中國傳教的邀請，遣使會遂勉強地接受了這個使命，因此令到該會日後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上舉足輕重。羅馬聖座在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七日正式任命遣使會到中國傳教，法王路易十六世在一七八四年一月廿五日批准這項任命。

萬桑在巴黎讀書時患了重病，使他到中國傳教的夢想曾一度幻滅。他的病況一直未有好轉，他的長上便決定送他到羅馬休養和讀神學。

一九零零年，中國的義和拳運動引發排外風潮，造成了一場中國天主教教難。據統計數字顯示，有

一萬八千名教友被殺，其中包括五位主教、四十名神父和無數的修女。這次運動結束後不久，北京代牧遣使會士樊國樑主教到羅馬述職。他下榻於萬桑所在的遣使會會院，並向修生們發表了不少動人的講話，重燃萬桑到中國傳教的心火。萬桑後來懇求樊主教帶他到中國傳教，樊主教立刻答允。在一九零一年二月十日，滿懷熱誠和衝勁的萬桑修士便正式開始踏上中國之途。他自此孜孜不倦地學習中國語言，對古文猶爲心醉，並改穿中國服，使自己完全融入中國的文化之中。他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來說可說是十分罕有。

萬桑在一九零一年晉鐸，改名雷鳴遠，意謂「雷光遠照」。他在一九零二年抵達中國後不久，便被林懋德主教委任爲京東大口屯總堂區副本堂。他愛中國文化；更愛中國人，很快便贏得了當地人民的信任和愛戴。雷神父常要求其他西方傳教士愛護中國人，並公開指責他們以家長式的心態對待中國人。他苦口婆心地提醒西方傳教士，倘若外國人繼

續操縱中國教會的領導權，這個教會便永遠無法成長起來。要成爲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中國教會的領導權便必須交在中國人的手裡。他認爲對中國教會的政策該是：「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可以想像得到，雷神父對中國人的熱誠、將一切中國化的主張及其堅強的信念，不但得不到他同會兄弟的認同，更令那些志在爲祖國攫取傳教領土的傳教士所不滿。但可惜的是，當雷神父提出有關對待中國人態度的主張時，已爲時太晚。如果所有在中國的傳教士都能夠聽取他的說話和學習他的表樣，很多不幸的事情便可避免了。

雷鳴遠神父在一九零九年於天津鹽山區始創傳信善會，該會的第一屆會議於一九一一年在天津勝利之后堂舉行，該會共有三百名積極會員，當日會議共有六十名代表出席。此外，雷神父同年又在天津開辦了第一所宣講所，向民衆講解天主教的道理，成效顯著。於是，他便在天津其他地方開設另外八間宣講所，不但吸引教友前來參加，連教外人士亦

經常到宣講所聽課。其後天津公教進行會的成立及《益世報》的出版，使宣講所的傳道計劃更加成功。《益世報》是中國第一份天主教報紙，雷鳴遠神父為紀念反清革命的成功，特別安排該報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益世報》的消息準確，言論公正獨立，加上愛國和反日的宗旨，它在出版三個月之後便成為華北最暢銷的報紙。

直至一九一六年為止，雷鳴遠神父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都十分順利。但好景不常，杜保祿主教在一九一六年到達天津後，想在法租界附近建主教府，他看中了老西開這塊距離法租界不遠的中國土地，希望能將它買下來。法國政府早便要求在這個區域擴展租界。現在杜主教提出這個買地建堂要求，便正合法國領使的心意。聖堂最後建在法國租界裡，但通往聖堂的大路一直開闢至中國的地方，法國領事認為有權保護道路的安全權，不但派法兵巡視，甚至還在通往教堂的大路上插上法國旗，此舉惹來輿論譁然，《益世報》猛烈抨擊法國領使館的所為。

這事件亦造成中國人對傳教士的敵視，全國仇外和仇教的情緒越來越明顯。雷神父的長上認為他身為《益世報》的創始人，須對抨擊法國領使的報導負責。杜主教下了一道禁令，不准雷神父與教內外人討論老西開事件。雷神父最後還被調到距離天津一千五百公里的寧波教區去。

如果說所有到中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都反對中國教會國籍化是不公平的。在二十世紀初期，有些傳教士便察覺到，中國教會如要像世界其他地方教會一樣充滿活力和朝氣，便要自立。

雷鳴遠神父的其中一個支持者是另一名遣使會士湯作霖神父，他是一名經驗豐富的傳教士，一直在馬達加斯加和中國傳教。他和雷神父都同樣愛中國人，都希望國籍司鐸能在中國教會擔任較高的職位，讓天主教會能在中國生根。湯神父像雷神父一樣，盡力把中國教會國籍化的構思向羅馬反映。他這樣的舉動不但得不到遣使會兄弟的贊同，更遭到排擠，趕出中國。

此外，雷神父亦得到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光若翰主教的同情。光主教在一九一九年被委任為教廷特派員，他耐心地聆聽雷神父的不滿和希望，二人在交換意見之後，都同樣表示關注國籍司鐸的晉升問題。光主教後來邀請雷神父到歐洲一趟，為選立國籍主教的工作而努力。終於，在雷神父、湯神父和其他關心中國教會人士的努力之下，教宗本篤十五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頒佈了《夫至大》通諭，其目的是把中國教會的領導權交回中國人手里。通諭指出要為國籍司鐸提供良好的靈修培育和學術培訓，「不應只讓國籍司鐸接受一個初步而低級的教育，使他們僅能晉陞鐸品便算……也不該只準備他們作外來傳教士的助手，而給他們最低的職務。」該憲章不但打擊以上所指的一般性不良做法，還有助制止傳教事業在以往的殖民地心態。為了催促教廷實現諾言，雷神父到羅馬與傳信部部長王老松樞機會面，向他提議了幾個國籍司鐸和主教的人選。雷鳴遠神父除了不遺餘力地爭取選

立國籍主教之外，亦為中國留學生作了不少貢獻。在中法協會（又名勤工儉學會）的支持下，雷神父在比利時和法國舉辦了歡迎中國留學生的活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本身亦曾留學法國，所以也大力支持中國學生的留學活動。中法協會的宗旨是訓練中國男學生成為工程師和幹部，領導未來的工人運動。雷神父知道共產黨員有反神職傾向，所以他便細心觀察那些中國留學生的舉動，他發現在這群學生之中，有部份人能夠獨立地思考。實際上，有些學生還對天主教會表示十分開放的態度。在一位名叫劉瑞宇的年青學生的協助之下，雷神父成立了一個「自由學生友善會」，其中有幾位會員最後還領洗奉教。

雷鳴遠神父為中國人的服務工作從未間斷。他於一九二三年在巴黎成立了中國公教青年會，並出版了一份中文報紙。其後又於比利時魯汶出版中文周刊，成立中比聯誼會，並在魯汶始創法文《中國公青月刊》。

一九二二年，法國在華所享有的保教權宣告結束。剛恆毅總主教於同年到達中國，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他明確地表示有許多地方必須改革。一九二三年，兩位中國籍神父獲擢昇為宗座監牧。一九二四年五月，剛恆毅總主教在上海主持首屆中國天主教大會時，兩位國籍教牧首次與其他外籍同袍平起平坐。更令人感到氣象一新的是，剛恆毅總主教親率首批六位中國籍主教前赴羅馬，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親自祝聖晉牧，充份顯示出中國籍主教的地位絕不遜於外籍主教。這是一六八五年羅文藻主教由北京宗座代牧伊大任手中接受祝聖以來，首次有中國教長晉牧，這也是教宗躬親主禮的原因之一。

六位新牧之一，包括河北省遣使會士孫德楨主教，他奉委為蠡縣代牧區主教。為了答謝雷鳴遠神父對成立國籍代牧區的大力支持，孫主教邀請雷神父前往新代牧區一行，於是，在一九二七年，「雷鳴自遠方回到中國」。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勝利，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但與此同時，共產黨亦日漸蓄養勢力，他們當時已吸納了超過四萬名黨員。日本亦在蠢動，於一九三一年出兵侵佔中國東北，並於一九三七年攻打長城。在抗日戰爭期間，雷鳴遠神父組織了救護隊，成員大部份都是耀漢小兄弟，他們分成小組在山西的山區從事救傷扶危的工作。蔣介石為了表揚雷鳴遠神父的人道工作，特別授以官銜。共產黨人以此為借口，於一九四零年初指使八路軍拘捕雷鳴遠神父及六位耀漢小兄弟。他們指責雷神父與國民黨有密切往來，要他受再教育。雷鳴遠神父於當年四月份獲釋，但經已十分虛弱。他於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聖若翰洗者瞻禮日在重慶一位中國友人家中病逝，葬於重慶市郊歌樂山。

今天，中國教友仍絡繹不絕前往歌樂山朝聖，在這位偉大傳教士的墳前，默思他對中國人的睿智和熱愛。